

跨越发展陷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路探析

武彦斌

摘要：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在发展前景光明可期的同时，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发展道路上的挑战主要包括：价值体系上的话语陷阱、发展道路上的制度陷阱、发展阶段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信任上的“塔西佗陷阱”以及国家关系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发展陷阱的应对主要体现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避价值体系上的话语陷阱；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下坚持制度自信，规避发展道路上的制度陷阱；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跨越发展阶段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避政治信任上的“塔西佗陷阱”；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跨越国家关系上的“修昔底德陷阱”。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陷阱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8)05-0011-12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8.05.00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P10)}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阶段，“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1](P2)}。习近平指出：“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2](P213)}当前，我国发展既要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披荆斩棘地接力奋斗，也要正视各种严峻挑战，未雨绸缪地规避和跨越相关陷阱。在新时代，我国发展的陷阱主要包括：价值体系上的话语陷阱、发展道路上的制度陷阱、发展阶段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信任上的“塔西佗陷阱”和国家关系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内在包含了对于如何规避和跨越这些发展陷阱的深刻思考，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了科学解答。

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避价值体系上的话语陷阱

“每种社会制度都有维护这一社会制度的主导价值观念，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关系决

基金项目：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资助项目重点项目“基于改革开放记忆建构的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路径研究”（2018ZD11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多样化社会思潮背景下湖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结构维度、作用机制及强化路径研究”（18Z310）；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多样化社会思潮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2016035）

作者简介：武彦斌，法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4）

定的。”^[3]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既需要实践上的成功探索，也需要理论上的科学阐释。成功的实践可以增强人民的获得感，科学的理论阐释可以促进人民对于发展阶段、发展事实、发展理念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为发展凝聚更大民意。

（一）价值体系上的话语陷阱

普世价值思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指鹿为马地解读为我国在践行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崇的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并预言“中国正在向世界文明大道回归”。其本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定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4]。西方价值观的鼓吹者亨廷顿承认，普世价值“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5]。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普世价值的巧妙之处在于其试图“以普世价值取代普遍真理，以价值掩盖价值实现方式”^[6]。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综合体，其上层建筑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7](P550)}作为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普世价值必然服从于垄断资本的全球奔走，其全球传播在客观上需要它“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7](P533)}，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说成是人类普遍价值。这一点在当今时代的制度竞争态势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社会在阶级存在的阶段，其价值体系、哲学、宗教、艺术等都表现出阶级性。建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需求，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的交锋也更加突出。价值观的传播在事实上被赋予了特殊的话语意义——表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理念和实践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譬如，“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P329)}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为了引起广大党员干部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0](P153)}。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的现状，习近平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不当旁观者，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守护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前沿阵地”^{[2](P327)}。这实际上明确了广大党员干部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责任，为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动员。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激浊扬清，成绩有目共睹。

（二）破解话语陷阱的中国之道

综观全球话语竞争态势，普世价值相关概念难以回避，不深究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一些群众甚至党员干部也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譬如，有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有人疑惑，“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甚至有人说，接受了普世价值，“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2](P327)}等等。这些对普世价值存在认识误区的人似乎不明白：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混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改变性质。对于包藏祸心的普世价值，习近平深刻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2](P327)}可以说，这一重要论述切中要害，有力地回应了普世价值的鼓吹者和应声虫。

基于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科学认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建设。其一，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法制支撑。2015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8]，这表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已纳入法律保护范围，规避话语陷阱从此有了法律保障。其二，坚持党管宣传，确保舆论有序可控。鉴于苏联解体过程中曾出现过的意识形态乱象，以及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10](P155)}。他深知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坚持舆论宣传的党性原则。他认为，“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9]，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三，推动新闻宣传工作强化导向意识，加强内容建设，完善传播体系。习近平指出，应当“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9]；在实际工作中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0](P156)}；传递正能量，要实现新闻媒体的全覆盖，“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9]。其四，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价值观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10](P168)}十八大以来，以“三个倡导”为集中表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伴随着一系列官方文件的出台、行动纲领的实施和行动计划的推进，全社会范围内正在形成基本的价值共识。习近平强调，我们要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0](P162)}。同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贯彻落实“党校姓党”基本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筑网络良好生态、抓好高校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都为规避价值体系上的话语陷阱提供了重要支撑。毋庸置疑，我国的发展是在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而不是别国的价值谱系。随着上述意识形态建设“组合拳”的不断发力和新的硬招实招的出台，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字眼的建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土壤的价值观念将日益失去传播的空间，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必将不断加强并最终跳脱价值体系上的话语陷阱。

二、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规避发展道路上的制度陷阱

从整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制度圈，涉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诸领域，其内圈圈层是诸领域的根本制度，再外一个圈层是诸领域的基本制度，最外圈层是诸领域的微观制度安排”^[11]。这种圈层式的制度体系，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贯穿其中，一经产生便打上了中国特色的深刻烙印，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充实和完善。习近平曾深刻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2](P288)}这是对我国政治制度重要性的权威表达。近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政治制度稳定是确保我国建设、改革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的核心。政治制度的特殊重要性既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依据，

也使其成为制度陷阱设计者们的“主攻对象”。

（一）制度陷阱的表现形态

一些崇尚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人，无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指责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把改革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譬如，2013年1月，针对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内某知名报纸在新年献词中称，“兑现梦想，自然要吸取世界经验。所以要认真审视希腊民主……”^[12]；有人说，中国“必须向美国的宪政学习”，“实行多党竞争的民主政体”；还有人说，“政党轮替，分权制衡才能消除腐败，解决当前中国政治存在的弊端”，等等。持这些观点的人，其目标直指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企图通过设置制度陷阱，扭转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事实上，“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要求实行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特别是三权分立、议会制度的声音从未停止”^[13]。归纳起来，关于我国发展道路上的制度陷阱可以概括为：以竞争性民主观否定人民民主观、以西式宪政否定我国依宪执政和依法治国。错误的认知往往将实践引入歧途，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这些国家落入制度陷阱的悲惨结果。如果我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仅会断送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将无从谈起。如果任由这些错误思想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中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的发展造成干扰。对此，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有清醒认识的，也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了必要而有力的回应。

（二）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高度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源自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继承，也得益于对其他国家民主政治经验教训的广泛借鉴，更来自于对我国历史上民主实践教训的深刻反思。从理论和逻辑上看，民主表现为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从历史和现实中考量，民主是追求“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并且把“实质民主”作为核心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但追求“程序民主”，而且更加注重实现“实质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2](P292)}这就为我国在今后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实现人民民主指明了方向。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国不仅保障人民在选举时的投票权利，也注重“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2](P29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调整基层选举的城乡代表比例、优化各阶层代表构成、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等，这些举措在客观上有助于广大人民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持续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促进了实质民主的实现。

（三）以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超越西方所谓“民主宪政”

民主宪政作为一种舶来品，其作为制度性实践却是“西方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14]。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进程都是在法制框架下进行的，即将国家政治发展道路、政党政治实践纳入法制轨道已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一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其法制发展状况构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脱离实际的法制找不到落实的根基，而离开法制规约的政治发展道路也有可能成为脱缰野马。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被框定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则受到社会主义法治的规约。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执政过程中一贯善于将代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文本，贯彻于广泛的政治生活。这就在实际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制发展过程中的资本逻辑，为我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法制保障。对于我国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强调：“我们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

执政，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P128)}。这就对我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更加注重《宪法》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明确要求，也是对所谓“西式宪政论”的明确回应。

（四）以“四个自信”夯实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的心理基础

“制度是从人们对其所确认和保护的利益认同中获得实践力量和肯定力量的，利益是制度认同的逻辑起点。”^[15]党的政治纲领完整地保留了《共产党宣言》的“红色基因”，并被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纵观历史，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生动诠释了我们党及其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的。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指出的，我国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仅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就取得了“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1](P5)}的显著成绩。这些成绩，离开科学合理的制度，是难以想象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党治国理政的落脚点。他在充分肯定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配套的制度建设。他指出：“要加强社会领域制度建设，扩大人民群众获得感”^{[2](P367)}，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获得最广大人民的高度认同，从而汇聚成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走向胜利。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精心设计的制度陷阱，习近平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P17)}这就深刻揭示了心理基础对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意义，为我国应当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了重要遵循。

三、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跨越发展阶段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宿命，提高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16]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我国的发展具有警示意义，本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将“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17]作为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习近平曾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18]可见，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然成为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面对的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面对中国版的“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指出，要“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2](P197)}。他还从方法论高度阐述了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性，集中表现为发展动力论、发展平衡论、发展和谐论、发展条件论和发展价值论。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崇尚创新的发展动力观

面对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版“阿喀琉斯之踵”，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P198)}，“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2](P201)}，并将创新发展定位为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P27)}，其内在逻辑是：加强我国的科教，是为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而人才应当是注重创新且能够创新的人才，这样才能为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同时，习近平坚持创新系统论的观点。他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2](P203)}这一重要论述，就将创新的系统性特征揭示出来，并且置于国际竞争的宏大视野中。崇尚创新发展体现了习近平对于发展动力的深刻思考。

（二）注重协调的发展平衡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这一重大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新时代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换言之，只有着力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才能促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发展不平衡是现象，发展不协调是本质。这就需要在实践中树立协调发展理念，不断增进“协调”。当前，我国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2](P198)}。为此，习近平强调，要“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2](P204)}。针对我国当前协调发展出现的一些新特点，习近平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2](P205)}这就揭示了协调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特点。理念科学非常重要，谋取成效重在行动。在贯彻协调发展理念过程中，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先后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等等，这为优化我国生产力布局，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奠定了基础。注重协调发展体现了习近平对于发展平衡性的深刻把握，协调发展必将在中国大地上呈现出自己的民族特色。

（三）倡导绿色的发展和谐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对于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生产过程高能耗、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建设的问题比较普遍，甚至在有些地方非常突出。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与此同时，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已然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必然需要。如何认识并有效解决这种矛盾已经成为衡量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习近平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P209)}将环境问题当作民生问题来对待，是对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诠释；将改善环境提高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来论述，体现了这一理念的牢固哲学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1](P27)}。将污染防治作为破解我国发展难题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充分体现了党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的坚定决心。推崇绿色发展诠释了习近平对于发展和谐性的准确把握，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必将推动我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四）厚植开放的发展条件论

我国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对外开放。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国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向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开放而被“腐蚀或吃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一步取得的成就，都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取得的；我国未来发展要想进一步取得成就，就不能不去深刻理解和把握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这固然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2](P213)}。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人

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中的话语权还亟待加强。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将自身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为此，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2](P210)}，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当然，我们所倡导的开放发展，其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离开这一点，开放发展无从谈起。习近平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开放发展理念的国际话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构建亚太、中非、中拉、中阿合作伙伴关系、G20峰会和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成功召开，以及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陆续推出的一系列“超过国际预期”的开放政策，都是对我国开放发展理念的具体贯彻。可以说，倡导开放发展体现了习近平对于发展条件的高度重视。

（五）推崇共享的发展价值论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发展为了谁以及发展依靠谁，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回答的问题，其中根本的问题是为谁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1](P44)}发展既要讲方法，更要讲目的。所谓讲方法是说如何把“蛋糕”做大；所谓讲目的是说如何把“蛋糕”分好。失去目的的发展和目的偏狭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以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发展，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不是我国发展的取向。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也必须承认，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平等现象还比较突出。习近平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2](P200)}我们倡导共享发展，就是在“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P213)}，就是为了着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2](P199)}。譬如：精准扶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等。因为只有把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了，“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国家发展也才能具有最深厚的伟力”^{[2](P200)}。注重共享发展体现了习近平对于发展价值的明确定位。

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规避政治信任上的“塔西佗陷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想不断取得成功，必须取得最广大人民的政治信任。这种信任可以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认同，并在生产生活中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可以说，“没有信任，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难以达成；即便能达成合作，也要付出高昂成本。”^[19]由此，政治信任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始终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发展道路上，与政治信任相关的一个陷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那就是“塔西佗陷阱”。出现“塔西佗陷阱”的根本原因是政党或政府公信力缺失。习近平曾对这一陷阱有过通俗的表述：“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20]这是我国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过程中必须要竭力避免的现象。

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10](P101)}。毋庸置疑，在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想保持改革浅水区所取得的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进而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将考验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和执政

能力。一个时期以来，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10](P368)}，必须着力消除。消除其中任何一种危险的努力，都会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事实上，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跨越“塔西佗陷阱”的思想，从应对“四大危险”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重塑和提振党和政府的精神状态，取得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状态信任

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执政党。然而，理论的科学、目标的远大和理想的崇高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党员干部的精神追求。在追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上，在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的背景下，“历史终结论”、“制度趋同论”、“共产主义空想论”等错误言论甚嚣尘上。对此，有些党员干部不敢亮剑、有些党员干部态度暧昧、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被牵着鼻子走”，不少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正在经受着严肃的考验。如果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则党的精神懈怠的危险必然有加重之虞。对此，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2](P34-35)}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了钙就会得“软骨病”。个体如此，全党亦然。我们党要想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不忘初心，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2](P4)} 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P20)}，而讲理想重信念则是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可以说，这是对消除精神懈怠危险的政治宣示。由此，以党的精神面貌的改善来促进政府的精神面貌的改善也就值得期待。

（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取得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能力信任

党和政府公信力的获得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的态度、能力和效果的认可。面对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现实，习近平指出：“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2](P102)}。他不仅要求改革要注重法治思维，还强调把握好改革的过程性，并以“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中梗阻”等比喻说明。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1](P4)}。习近平眼中的改革，不仅在方法上讲求重点难点、时间节点，而且在价值追求上始终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他强调，我们要“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2](P102)}。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党和政府团结带领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1](P8)}，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获得显著提升。

（三）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取得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关系信任

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始终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高度关注的问题。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并最终取得政权的。残酷的斗争环境并没有将我们党压垮，反而促进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并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后，面临的风险考验并没有因为战争环境的消失而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成分多元化、社会组织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多样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等现实状况，为党和政府增强公信力带来了巨

大挑战。习近平指出：“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10](P367)}为此，我们党号召全党持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加强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作用而言，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10](P367-368)}。事实证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逐步加强，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脱离群众”这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从而避免我国成为“泥足巨人”。

（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取得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性质信任

长期以来，关于“反腐败一阵风”、“反腐败是政治作秀”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甚广。这是“老不信”问题在反腐败方面的集中反映。为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领导、周密部署，重拳出击，反腐肃贪，取得了显著成效。十八大以来，“440多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多名厅局级干部、6.3万多名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惩处，反腐败力度史无前例、成效举世瞩目。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21]然而，随着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一部分人认为“反腐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该停一停了”。“反腐中止论”开始流传。对此，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2](P63)}十九大之后，鲁炜、刘强、张杰辉、冯新柱、季缙绮等人的落马，有力地回应了社会上的错误看法，进一步证实了党领导下的反腐败斗争是“真反腐，反真腐”。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并在深入调研试点的基础上，推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为全面从严治党奠定了法律基础；我们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为全面从严治党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些都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有力举措。可以说，只有这样的政党，才是能够取得人民信任的政党。由此，我国才能成功跨越“塔西佗陷阱”。

五、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跨越国家关系上的“修昔底德陷阱”

（一）和平与发展背景下的共有问题与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为内容的传统安全已经不再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与此同时，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P57)}因此，在面对人类社会共同挑战的时候，既需要准确把握这些挑战和问题所形成的主客观原因，也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应对挑战。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国发展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要是在二战后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建立的。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世界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市场的发展，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调整的压力。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面前，亟需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既是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结果。一定的秩序总是维护一定的主体的利益，秩序往往成为利益的表达体系和维护工具。发展中国家在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格局下，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其发展过程也充满艰辛。在人类社会面临发展、变革和调整的时期，如何正确对待这种发展、变革和调整，恰恰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在旧有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毫不夸张地说，

中美关系是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必然涉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调适。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被经常性地用来描绘中美关系的现实境况，甚至习近平也曾指出：“我多次讲，我们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要处理好同美国等大国的关系。”^{[2](P240)}足见中美关系在我国外交关系中的重要性。

（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方案

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在北京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便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22]至于如何达到同舟共济、和衷共济，习近平也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即通过相关国家确定共同目标和规则并付诸实践才能建构起来的更高质量的人类社会发展状态。这种发展状态已经超越了以国家间不冲突不对抗为衡量标准的状况，它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正如习近平所阐述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状况可以概括为“五个世界”，即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和清洁美丽的世界。

就如何建立持久和平的世界，习近平指出：“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2](P541)}这就为构建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国在处理“中日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中印洞朗对峙”等涉及我国领土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上的举措就充分贯彻了这一理念。如果说和平是就整体国际局势来讲的话，那么现实中，不少国家和地区还面临着一定的安全挑战。这些安全挑战既包括传统安全挑战，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挑战。对此，习近平强调，“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2](P541-542)}。这正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一国安全与外国安全上的辩证思想。

当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成为了现实，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就有了基本秩序前提。世界各国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当中谋求自身发展就成为可能。习近平认为：“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2](P541)}为此，他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作为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的基本原则。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将自身发展与外国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的创造性实践，是在国家间求取发展这一最大公约数的典范。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交往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当然，面对差异性甚至异质性文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所持的态度和应对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和民族对外来文明采取包容借鉴的态度，有的国家和民族则抱着文明优越感而对外来文明持蔑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对此，习近平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2](P54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在文明交往层面要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只有这样，世界各国才能在发展中加强联系，加深理解。而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个生态文明的根本主题不仅仅是哪一国哪一个民族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在地包含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习近平指出：“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2](P544)}这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具有警示意义，尤其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旧的国际分工中加快发展的同时统筹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六、结 语

事实上，我国发展过程中的陷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步步落入陷阱（哪怕是从警示意义上讲）而浑然不觉，可怕的是明知陷阱的存在而不从理论上给予科学解答，不在实践中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前述几种陷阱，其背后的客观事实指向了我国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国内外问题和应对的挑战。陷阱并不会自动消失。陷阱既有客观存在的，也有人为设计的。客观存在的陷阱，需要我们增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导向，着力的破解之；人为设定的陷阱则是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发展的国家间竞争而有意为之的结果，这需要我们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增强忧患意识，从更加宏观的视野去审视自身的发展。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调整和国内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我国发展道路上的陷阱还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并展现出它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的理论，其对我国成功跨越发展过程中的陷阱，既有战略考量，也有技术指导；既有横向布局，又有纵向思考，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智慧结晶，其必将随着我国发展条件的变化、发展阶段的推进、发展问题的解决而得到进一步丰富。在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必将不断战胜各种挑战，跨越发展陷阱，最终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3] 陈先达. 衡量观念更新的尺度不能模糊[J]. 红旗文稿, 2017(19).
- [4] 卫兴华. 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N]. 人民日报, 2015-11-30(007).
- [5] 陈曙光. 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5).
- [6] 武彦斌, 吴东华. 普世价值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构逻辑及其辨正[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 [7]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5-07/01/c_1115787801_3.htm, 2015-07-01.
- [9] 习近平.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19/c1024-28136159.html>, 2016-02-19.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11] 项久雨. 《共产党宣言》的中国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5).
- [12] 南方周末. 2013年新年献词. 中国梦, 宪政梦[EB/OL]. <http://jiaren.org/2013/01/06/xianci-3/>, 2013-01-06.
- [13] 辛向阳. 看待“西式民主”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J]. 前线, 2017(7).
- [14] 潘啸, 王虹. 对我国宪政资源的历史考察[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6(3).
- [15] 郭莉, 骆郁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的本质[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11).
- [16] 张宇.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等收入陷阱”[J]. 求是, 2015(11).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322.htm, 2016-03-17.
- [18] 习近平. 中国肯定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EB/OL].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1111/c1004-26004320.html>, 2014-11-11.
- [19] 黄涛. 超越“塔西佗陷阱”的三道坎[J]. 红旗文稿, 2014(12).
- [20] 习近平. 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8/c_

128206459.htm,2015-09-08.

[21]王岐山. 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107/c1001-29630393.html>,2017-11-07.

[22]习近平. 在北京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亲切座谈[EB/OL]. http://www.gov.cn/ldhd/2012-12/05/content_2283523.htm,2012-12-05.

Overcoming the Development Trap: An Analysi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U Yan-bi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While China has a bright prospect for development, it is also facing very serious challenges. The challenges on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mainly include: the discourse trap on the value system, the institutional trap on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the “Middle-income trap” o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Tacitus trap” on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Thucydides trap” on national relation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s a clear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hina’s development trap,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uphold institutional self-confidence so as to avoid institutional pitfalls on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law-based governance; put forward and implement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on transforming development mode so as to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across the development stage;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party and state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so as to avoid the Tacitus trap of political trust; propose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o as to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in 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Xi Jinping; New era;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trap

(责任编辑 孙 洁)

我校七项成果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日，鄂政发 [2018] 36 号文《省人民政府关于颁发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通报》正式下发，我校共有七项成果获此殊荣。其中，外国语学院王四海的项目“中立土库曼斯坦：20 年的进步与辉煌”、经济管理学院郭海湘的项目“石油储层的智能识别理论与方法及其在油田中的应用”、学报（社科版）主编刘传红“漂绿广告”监管系列论文分别荣获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马克思主义学院阮一帆的项目“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所彭湃的项目“大学之治：道德领导的思维向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军的项目“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信息工程学院周琪的项目“面向道路地图的模式识别与智能表达”分别荣获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